

收左右逢源之效。

蘇俄最初原將目標放在南亞地區，可以溯自列寧與史達林時代，自蘇俄十月革命後，即在塔什干成立了「印度策進委員會」，企圖利用東方與西方抗衡的策略，將重點放在中國和印度，認為只要印度與中國落入共黨的掌握，則中南半島之歸併便不成問題。

史達林說過：「每一分鐘都不要忘記東方，至少它是帝國主義取之不盡的後備力量與可靠的後方。東方各國有不可列舉的天然富源，難道對於世界各國不是糾紛的蘋果嗎？」史某所關心的並不是東方被帝國主義剝削，而是想利用東方各國有利的條件，作為培養共產主義細菌的溫床。

匪共於「八全大會」後，曾將「東南亞決策委員會」改組為「東南亞統一作戰部」，並在北越、緬甸、寮國、高棉等地分設「工作指揮部」。於一九五〇年十一月透過胡志明在越北羅山召集東南亞各國共產黨頭目，將以前之「聯越陣線委員會」改組為「東南亞解放委員會」，名義上雖然由胡志明擔任主席，實際上則由匪共之「東南亞統一作戰部」在幕後操縱。

現在越南、高棉已全部陷落，寮國的中立之局，已名存實亡，而緬共的

武裝叛亂，更在加緊進行；如果美國不再放棄其與匪共的勾搭，則無異直接鼓勵匪共繼續向泰國、馬來西亞等地區南侵。

就蘇俄而言，近年來曾給予河內大量軍援，現在越南共黨獲得軍事全勝，美國勢力完全撤出，蘇俄必然用力向東南亞推進其滲透顛覆工作。

總之，共黨對外擴張的目的是一致的，但在共黨陣營呈現分裂的局面下，中南半島地區將成為蘇俄、匪共與河內共黨政權施展權術，爭奪影響力的地區，也將是如何決定中南半島局勢的重要因素。

註①所謂東京灣事件，係於一九六四年八月二日及四日，北越多艘魚雷艇先後攻擊美國艦隊。八月五日詹森總統乃下令出動大批飛機轟炸北越，北越受此教訓未再滋事。惜美國未能長久保持此種決心，反而受越共之欺騙。

註②「骨牌理論」原應用於抵禦共黨顛覆，為最早專欄作家約瑟夫·艾索普所杜撰。於一九五四年艾森豪總統同意支援奠邊府法軍反抗越共，即基於此一理論。福特總統此次又將二十年的老理論拾出，來提醒美國人仍應援助中南半島，但國會參眾兩院却置之不理。

註③原載於一九七五年一月廿七日出生之「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

匪日學術文化交流不歡而散

趙倩

最近日本政府應中共之邀，派遣「學術文化使節團」訪問中國大陸，由於意見分歧，先由「爭論」演成「口角」，結果不歡而散。

就常例言，凡係邀請一國的學術文化使節，來訪作文化交流活動者，大多是賓主之間，文質彬彬、推誠相見，在融洽和諧的氣氛中，圓滿達成使命。

但是，中共並非如此，它的作法是「賓至如囚」，在頤指氣使和強詞奪理的情形下，終於使賓客抱頭鼠竄，在尷尬難忍的窘境下，祇有返國後口誅筆伐之。

日方使節中，回國後不屑一談者有之，但不甘受辱，發表觀感和敘述事實真相者也有之。為了不失傳真起見，特引證日本報紙刊載的原文報導，歸納如下以供參考。

一九七二年四月，偽「中日友好協會會長」廖匪承志率「代表團」訪日

匪日學術文化交流不歡而散

時，曾邀請日本政府派遣一個學術文化代表團訪問匪區。日本政府認為與匪「建交」後，為了促進雙方文化交流，也很願意派遣一個規模和陣容龐大的使節團前往造訪，但是日匪關係「正常化」之後，一切實務關係進展并不順

利，所以一拖兩年并未實現。

近來因爲日匪貿易走向下坡，漁業談判也不順利，特別是所謂「和平友好條約」問題中的「霸權」之爭，使日匪關係的進展越趨黯淡，於是日本政府爲了沖淡一下這種死寂的僵局，就想起以文化交流「報聘」的決定。今年二月底日本政府即着手策劃，並且爲了要發生一點作用，曾經煞費苦心，着意安排，選出所謂第一流的學人，預備在日匪關係能够起死回生。

中共的僞「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同意日本政府的「報聘」後，日本政府於三月八日正式決定，要派遣一個代表官方的「學術文化使節團」訪匪，團長由京都大學名譽教授吉川幸次郎擔任，團員二十二人均係當代著名學人，另外有政府外務省亞細亞局的中江次長等政府有關的官員隨行，規模的龐大與陣營的堅強，的確非同以往。根據日匪雙方的安排，訂於三月二十四日起程，在中國大陸訪問北平、西安、上海、桂林等地，此行之主要目的乃是加深雙方在學術文化方面互相瞭解，並且使匪日雙方的學者、專家能够充分交換意見，在訪問兩星期後定於四月七日返回日本。

日本學術文化使節團的名單如下：

團長：吉川幸次郎 中國文學專家、京大名譽教授。

團員：茅誠司 物理學專家、日本學士院院士。

石川淳 作家、日本藝術院會員。

越智勇一 獸醫學、日本學術會議會長。

堀江薰雄 國際經濟、日本貿易研修中心會長。

櫻田一郎 化學、學士院會員。

永井龍男 作家、日本藝術院會員。

彌永昌吉 數學、東京大學名譽教授。

山本健吉 文藝評論家、日本藝術院會員。

長尾雅人 佛教學、京都大學名譽教授。

內村直也 戲劇作家。

神原 仨 醫學、日本筑波大學副學長。

中村光夫 文藝評論家、日本筆會會長。

川野重任 農業經濟、東京大學名譽教授。

林健太郎 歷史學家、東京大學學長。

小西甚一 國文學、日本筑波大學教授。

森口繁一 計數工學家、東京大學教授。

佐伯彰一 文藝評論家、東京大學教授。

藤澤令夫 西洋哲學家、京都大學文學部長。

中根千枝 文化人類學、東京大學教授。

曾野綾子 作家。

祕書長：衛藤藩吉 國際關係論、東京大學教授。①

不分古今中外，文人學者似乎具有一個共同之處，那就是立場超然、稟性剛直，幾乎不啻是在作學問上，甚至對任何事體，都有一種守正不阿的情操和個性。記得在中共搞「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日本一批著名的作家大宅壯一等一行七人，訪問了匪區時，就是因爲這種守正不阿的個性，與中共幹部爭吵之後，一氣之下返回日本，咸認自己化費這筆旅費，去受這種窩囊氣太不值得，并且譴責當時日本一般政客爲匪張目；竟然未有一人敢出面駁他，所以文人和學者與投機政客跳樑小丑顯然不同。

二

吉川幸次郎教授，出生於純樸的神戶，在日本京都大學畢業後，曾到北平大學留學三年，然後進入東方文化研究所專攻中國文學。一九四七年起在京都大學任教授、文學部長，迄一九六七年退休，現爲日本藝術學院會員，雖已年屆七十，但離開杏壇後終日埋首研究唐代詩人杜甫作品，專攻中國文學達五十年之久，遴選爲使節團團長，自有其背景。

從學術地位上看，他從取得學位的「元雜劇研究」論文起，對中國的詩詞小說、戲曲等研究著作，編印成「吉川幸次郎全集」達二十二卷，最近繼之將有另外四卷付梓。除對唐詩和漢詩特別有興趣外，對中國話說的也很流利。但是他的爲人更爲一般人所稱道，在學校是著名的「厲害老師」，平時一言一行更是慎審端正，咸認是一位很正派的學者。所以渠當選爲團長之後，團員無不深慶敬仰，不過吉川教授本人却不以爲然。

吉川受命之後，曾接受親匪的「朝日新聞」訪問，并公開表示稱：「我訪問『新中國』尚係首次，雖然毫無信心，但是，我很願本着實事求是的原則去交換意見。」，又稱：「即使是同文同種，也不能把互相瞭解視爲是很

簡單的事，否則就犯了大錯。」。吉川坦率的表示：「這就和講話一樣，各有講法不同，彼此之間無論在想法上，或是文明方面，一定要站在明知各有不同的見解上，互相尊重對方，否則就談不上做到真正的瞭解。」②

又在三月十四日，政府爲使節團壯行，曾在日本政府外務省內召集全體代表舉行了結團式。宮澤外相要求彼等，此行能够豐收成果，俾作政府未來的決策參考。吉川團長也曾表示：「日『中』之間雖係同文同種，但隔閡甚大，若不互相先行認識缺點，則無從獲得真正的瞭解，但願此行能够很輕鬆的作實地觀察。」當天，宮澤外相陪同吉川等一行前往國會大廈晉見三木首相時，三木亦曾以「此乃政府首次派遣大型的使節團訪問，希望滿載成果而歸」加以鼓勵。吉川坦白表示：「請先勿期待有何大的效果，此行祇是爲透視將來的文化交流，並願爲奠定基礎而盡力。因爲這不祇是僅僅去瞭解『中國』的實情，還要盡力使中國人也瞭解日本文明的獨特性格。」③

綜觀以上所述吉川團長的主張和見解，即不難發現他對中共早已深有認識，不過，以他個人來說，由於見多識廣，加上謹言慎行，自然不會太固執的去冒犯中共。但是，以他率領的團員成份來看，人文科學家有六人，社會科學家有四人，自然科學家有六人，作家和文藝評論家六人，這二十二位學者中，有的年輕氣壯，有的爽朗耿直，一旦在桌面上與中共的「學人」爭論起來，後果如何是意料中事，所以難免在啓程之前，便已憂心忡忡了。

吉川團長等一行於三月二十四日到達北平後，頭三天的活動未見任何報導，二十七日上午訪問匪僞「北京大學」，由革委會副主任兼物理學系教授周匪培源、歷史學系教授周匪一良、哲學系教授馮匪友蘭等有關部門的老師和工農兵出身的學生舉行座談，并由周匪培源簡報「開門辦學」的實況，以及透過「文革」和「批林批孔」運動實施教育改革的實情。當天下午又分成哲學、歷史、文學、經濟、物理、數學、生物、化學等五個小組，舉行專題分組座談交換意見。另外在當天晚上，閉門靜養久不露面的郭匪沫若（僞中國科學院院長、全國人代會常務會副委員長、中日友好協會名譽會長），在人大大會堂歡宴接待。

詎料問題發生的第一回合，竟然是在「北京大學國文學系」的分組座談會裏。三月二十七日下午文學分組座談，中共方面是由該系教授向匪形契等年輕老師和學生首先引發爭端，日方出席的作家和文藝評論家計有石川淳、

永井龍男、曾野綾子、山本健吉、中村光夫、佐伯彰一、內村直也等人。導火線是由文學創作方法引燃，先是「爭論」比較溫和，後來進入「口角」和「譏諷」，結果不歡而散。據向匪形契的共黨八股說法：「教授和學生必須進入工農兵的羣衆裏，從他的體驗過程所獲的素材產生創作。而創作也必須由老師、學生或有時加上工農兵一起去作。文學和藝術必須爲勞動羣衆服務，爲社會主義建設而服務。」

聽膩了共產八股的日本評論家中村光夫很有疑問，他請教說：「固然從事文學者體驗生活很重要，但是在年輕時也需要多讀古典。關於這一點，我聽到『中國』方面也讀古典，甚爲安心。但是，將從事文學者集中培養，我覺得很有疑問。從事文學最重要的不是要靠自力而爲的精神嗎？又如文學家的自發性與社會的需求又怎能適應呢？」在中村提出上述質問之後，向匪形契還未作答時，突然有一個年輕專攻現代文學的教師理直氣壯的說：「從事文學最重要的是要瞭解當今的社會生活。文化大革命後，文學家已深入羣衆的生活，並且體驗了他們的生活，因而產生了描寫羣衆的意念和任務感。作家撰寫作品乃是爲了羣衆的需求，而能達到他們的要求，我認爲是很光榮的。我個人進入大學來，乃是爲了人民，所以創作的目的是很明確的。」④

中村光夫聽了這番話之後，有點兒迷惑的說：「聽到各位能够如此埋首苦幹，希望今後更創作很多的作品。」但是山本健吉却實在不耐煩了，他以聲調略微激昂的語氣諷刺的說：「我在一九五七年來訪時，當時接待我們的『中國作家聯盟』的周揚（文革時被整垮台）所說的，和你們今天所說完全一樣麼。」中共方面聽了此話爲之光火，本來有兩個年輕人要起來反駁的，但是主持人一見，反正雙方這樣「口角」下去意見無法合攏，乾脆宣佈時間已到散會了事，至此，第一回合的衝突告以結束。⑤

日本的使節團一行結束了在北平的第一階段訪問後，於三月二十八日搭乘「專機」飛往西安，在西安參觀陝西省博物館及市區，停留兩日後再於三月三十日飛往桂林，參觀僞「廣西僮族自治區」的人民生活，遊覽當地奇景名勝。然後依次訪問上海，但日匪雙方均未報導詳情。

三

第二回合的「口角」場面，是在吉川團長一行訪問過中國大陸西北和西

南之後，返回北平作第二階段訪問時，在「北京飯店」的新廈裏。導火線仍然係引自作品創作的座談會上，日方出席的有吉川團長，石川淳、永井龍男、曾野綾子、山本健吉、中村光夫、佐伯彰一、內村直也等文學家全體團員。中共方面則有小說家的浩然，戲劇作家嚴文井、王縝等匪幹。

曾野綾子聽了匪方一片「批林批孔」的「大道理」之後曾質問說：「我已瞭解批判孔子的意義，但是我覺得將孔子作全面的批判否定，不應該是文學家應有的態度。我在此請教各位，你們對孔子是全部否定呢？抑是部份的否定呢？」浩然當場毫不猶豫的答稱：「當然是全部否定。」於是曾野綾子繼續又問：「你們說作家必須進入羣衆，工農階層，以生活體驗到的素材，表現在文學上。我認爲像這樣的創作雖然是可以的，不過，像這樣的寫作，又怎能成爲文學呢？」山本健吉當時也表示意見說：「所謂文學，是不可以摻進口號的。那祇是作品而已。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一點。」⑥

結果勿論曾野的意見，或山本的意思，中共方面根本就弄不清楚，一直爭論到座談結束，雙方的意見仍未啣接起來，最後終於又是一哄而散，草草結束了第二回合的爭論。

當吉川團長返日後，日本「產經新聞」記者在羽田機場採訪時，曾問及第二回合的爭論真相，但是他們都不願詳述，祇是對此爭論分別發表了個人的感想如下：⑦

吉川團長表示：「談到文學的問題，我覺得『中國』方面，在憲法中規定是『要爲人民而服務』的，這和保障文學乃至言論活動之自由的日本比較起來，可以說雙方在基本立場上本來就完全不同，所以，我想爭論到最後意見不能合攏，也係當然之事。」

曾野綾子表示：「把我想的話率直的說出來了。對方對我所問的，並不給我答覆，祇是說明『中國式』的創作方法和態度。雖然未能談得攏，不過，我事先早也料到是這樣了。」

中村光夫表示：「談到在『北京大學』發生爭論的事，到後來總算比較好了一些，總而言之，他們對文學所持的觀點，與我們日本完全不同。算了，不談也罷。總算雙方都清楚的發表了不同的意見和見解，能够作到這一步，我覺得也算有意義了。」

石川淳表示：「此即所謂『和而不同』也。」簡單明瞭，似乎是有點兒

不屑一談的意味。

除了上述「兩個回合」的「口角」座談之外，最使日方使節團難堪的是連個人發表意見的自由都沒有。俗說：「話不投機半句多」，這些日本學人對中共不阿諛獻媚，本來已經使中共不滿了，反而去揭中共的瘡疤，豈不更使中共恨之入骨。本來在中共控制之下的中國大陸，人民沒有說話的自由，已經是司空見慣了，即使是被邀請的外賓，當然也不例外。問題就是發生在四月六日凌晨，當總統 蔣公崩殂的噩耗傳到北平時，如同晴天霹靂無不爲之震驚。日本時事通信社駐北平記者，將此驚人消息走告正在當地造訪的日本使節團後，無不爲此一偉大恩人哀悼悲慟，特別是該團的祕書長衛藤瀆吉教授，對該記者說：「(一)目前台灣的國際環境，不會因 蔣介石之死有所改變。(二) 蔣介石氏經過國民革命和抗日戰爭兩個過程，已成爲民族的英雄。最後，他雖敗於國共內戰而退到台灣，但是一九五七年時，『中國方面(指周匪恩來)』也以 蔣先生呼之，尊爲一個愛國者。」詎料時事通信社記者由北平發至東京的上述訪問電訊報導，竟使衛藤教授這一番對 蔣公的讚詞出了問題。⑧

中共對此自然借題發揮，以圖馴服這批挑眼的學人，廖匪承志等人首先認爲衛藤教授以賓客身份在北平做如此談話，是對「中」日友好的一種傷害。繼之僞「中國對外友好協會」常務理事孫匪平化對衛藤教授表示強烈的不滿，因爲衛藤教授對時事通信社記者說了上述的讚詞之後，更不該在四月六日晚上，在日本學術文化使節團團長吉川幸次郎於「北京飯店」舉行的答謝宴會上，對同席的僞「對外友好協會招待所主任」單匪達圻及中共有關人員，又重複的作了對總統 蔣公如上述的評價。⑨

孫匪平化於四月七日立即召請日本朝日新聞、讀賣新聞駐北平的特派員，發表了一番針對衛藤教授的發言而作的批評。從孫匪談話內容看來，已顯示出他已和衛藤教授面談過話。同時他對日本記者表示，「以一個日本政府派來的學術文化使節團祕書長的身份，在『中國首都』的北平讚揚 蔣氏，他這種態度對『中國人民』是不友好的，顯著的傷害了基本的立場和心情。」衛藤教授於四月七日返抵東京後，亦曾表示確曾發表過上述談話，並且檢討是屬輕率。至此，這一樁訪中共所發生的不愉快事件即告結束。其實在中共控制下的中國大陸，人民早已知道不僅沒有說話的自由，有時也有不說

話的罪名。如果日本使節團在北平訪問期間，毛匪澤東突然暴斃的話，日本學人保持緘默不表意見時，廖匪承志和孫匪平化同樣會因「不說話」而表示不滿。

四

日本學術文化使節團一行，結束訪匪活動後，於四月七日夜返回東京，這些學者回國後，有者不屑一談、有者發表觀感，大體說來在「尊重體制」的原則下，祇是批評中共的制度是如何及作法又是如何！但終不免對將來的後果仍有置疑之處。所以綜觀各人的感想，可謂毀譽參半，不過最具代表性的，要算是女作家曾野綾子的中肯見解了。

作家曾野綾子認為中共表現的方法，無不走向極端，她列舉了幾個特徵如下：^⑩

『(一)對於一切的事都是「全面的」：我這次特別請教關於「批林批孔」的事，本來我疑為中共只是批判孔子的部份言論，事實上他們是全部否定。與孔子對照的是毛澤東，但是我却未聽到一點點對毛澤東的批評。即使對毛澤東稱之謂毛帝，我想也并非不自然。所謂「全面的」，就是對象一定要批評的百分之百的壞人，視如惡魔一般，對一個一點兒也不批判的人，就尊之為神了。所以勿論好人壞人，變成都不是人了，在白髮三千丈的國度裏，令人感到沒人在，却有很多的神和魔鬼。』

(二)沒有人訴苦和不幸的事情：我在訪問期間感覺與日本不同之處，即沒有人談到生活中有何不得意和抱怨，但至少我見到的那種差距，恐怕是應該有的。但是中共表現的方法是，凡是沒能順利達成的，都認為現在是順利的，不到最後非結束不可的地步，也不會發表。另外就是在特定的高階層中，都具備了一套「中國式的謙遜」，譬如在上海時，中共中央委員徐景賢在晚宴上說：「務請各位多看上海壞的一面」，但是他却明明知道明晨我們一早就要離開上海飛回北平。又如渠稱：「『中國』比起日本來實在是大窮了」，像這種話也只有出自像他這樣地位之口，而一般人則想拐彎抹角的也不敢講，這即所謂中國古有的修詞學吧！至於一般人不敢講話的原因，我也

研究了很久，假若是不錯的話，這完全是由於知識被封鎖的關係。我最近曾與一位在中國大陸居住三十年的日本婦人談天時，她說：「原來日本變成這樣了，過去我一點都不知道！」

(三)他們對日本或日本人幾乎毫無興趣：雖然見面時常說：「我願意聽聽您各位的批評」，其實，他這是表示你們看我們的吧！但是，在正式舉行分組座談時，他們寧願呆坐幾個鐘點，却不對日本的文學提出一個問題。有人說這才是「中華思想」咧！不過，我深深感覺到像這樣毫無興趣的表現，讓我們今後如何着手去瞭解「中國」，實在是頗值考慮。

(四)這是最特別的一個特徵，即中共的每個人都講一樣的話，就好像是一個教一個似的，說的完全一模一樣。尤其談到「和平」、「友好」時，千篇一律的都是「中日友好要子子孫孫的繼續下去」！這成了任何階層到小孩的口頭禪了。要知道自紀元前一五〇〇年起，迄紀元一八六〇年止，在世界上僅僅這三三六〇年間，各國大大小小的已簽訂了大約八千多個「和平條約」，無不是標榜「永久維持和平」的，但是沒有一個真正是永久的，平均每一個只能維持兩年而已。我并不是不相信日「中」友好無法永久維持下去，不過，我覺得「和平」確實是個很現實的東西，我們必須對它要有一種痛苦的認識。』

註① 一九七五年三月九日日本產經新聞。

註②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三日日本朝日新聞。

註③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五日日本朝日新聞。

註④ 一九七五年四月八日日本產經新聞。

註⑤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及四月八日日本產經新聞。

註⑥ 同註④。

註⑦ 同註④。

註⑧ 一九七五年四月八日日本朝日新聞及產經新聞，一九七五年四月廿三日聯合報。

註⑨ 一九七五年四月八日日本產經新聞。

註⑩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八日日本產經新聞。